

內部刊物 請勿外傳

西安事变资料选编

第二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〇年五月

目 录

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	何柱国 (1)
张学良与苏使秘密会晤	焦绩华 (11)
《活路》小册子泄密问题	王惟之 (14)
西安事变前夕的片断回忆	刘多荃 (17)
我在西安事变前后的一些经历	谢晋生 (20)
西安事变的回忆	袁克征 (27)
东北骑兵军在陕甘时我的见闻	汪 璠 (31)
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接济红军的一段经过	张政枋 (38)
西安事变前后我的经历和见闻	范长庚 (42)
我在西安事变前后的一些经历	王化一 (45)
回忆杨虎城将军和他与蒋介石的关系	李志刚 (59)
西安事变时张杨两军的军事部署	孟吉荣 (88)
西安事变时高福源去开封的经过	秦诚至 (95)
高福源史料片断	周祖尧 (98)
西安事变的片断回忆	李维城 (106)
图存学会与西安事变	杜超杰 (117)
西安事变中我到晋绥见阎、傅的简单回忆	苗淳然 (127)

于右任赴陕宣慰被拒记·····	王惟之	(130)
西安事变后赴华北进行宣传工作的回忆·····	陈雨皋	(134)
张学良送蒋回南京以后的一段回忆·····	阎宝航	(139)
西安事变中我奉命奔走和谈的经过·····	李志刚	(148)
西安方面与顾祝同接谈经过·····	谢 珂	(161)
参加调解西安事变的经过·····	陈 端	(165)
西安事变后三十六师进入西安的经过·····	宋希濂	(174)
甘泉劳山战役始末·····	张政枋	(182)
东北军六十七军调往陕西及劳山战役前后·····	赵国屏	(190)
东北军一一〇师劳山就歼亲历记·····	周祖尧	(194)
甘泉被困记·····	周祖尧	(199)
东北军骑兵师吴起镇被歼目睹记·····	马培清	(210)
东北军一〇九师直罗镇被歼记·····	沈叔铭 邱立亭 王肇治 唐振海	(215)

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

(1934——1937年)

何 柱 国

一九三四年初，张学良将军返国，主张安内攘外，统一救国，励精图治，作收复东北之准备，乃接受蒋任命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的职务。原任总部参谋长钱大钧请求辞职出国，经蒋批准。张将军拟调我为参谋长，吴家象为秘书长，经我力劝仍以钱大钧任参谋长为宜，乃派我赴南昌请蒋收回成命，并准将王以哲军调驻豫南，何柱国军调驻鄂东，刘多荃师调驻平汉线南段，对鄂豫皖边区红军徐海东部作战，徐部旋走陕北。

张将军自回国以来精神焕发，身体强健，已恢复一九二七年以前之健康，时常到鄂东、豫南出巡，常与部下畅谈旅欧见闻。他说在英国参观国会辩论，乃真是发言自由，态度和蔼，有民主作风。有人问他，中国是否可以学英国的民主来救国呢？他的回答是不可行的，因为他们是资本主义，经过长期的经验，民主作风深入民间，钱的作用是很大的。我们是半殖民地的国家，尚未产生开明的、大的资本家，所以政党政治很难稳定下来。我们军人，要想领导民主政治更是南辕北辙。他又说中国的政治要安定非用开明的集

权政治不可，国家的建设要想迎头赶上，亦只有此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线：一为法西斯蒂路线，一为共产主义路线。可惜我不能到苏联游历一下，就我所知，共产主义成功的条件，要在阶级矛盾极其尖锐的国家，又无外患的情况下方能实行，我国是半殖民地状态，是不适用的。剩下只有法西斯蒂一条路，模仿德、意，乃能迅速复兴中国。墨索里尼说过：“工作是大家的，讨论是少数人的，决定是一个人的。”法西斯蒂大会如在领袖缺席时要选举新的领袖才开大会。资本家的利润有限制，工人不许罢工，彻底执行法令。德国希特勒亦是如是作法，一定很快复兴。他说回国后会劝蒋摹仿这种办法，蒋答：“也许五年以后我可以考虑你的建议”。他又说：“蒋手下各派如政学系是人才多而无政治基础，CC是有基础而无人才。我们是军人也只可以与黄埔系连成一气，共谋救国。所以我要在东北干部中组织四维学会以训练人才，与黄埔系打成一片，但部队的带兵军官不能加入此组织。”后来又因广西李、白以抗日救国为号召，常与中央分裂，蒋极感不安，有用武力解决之意。张将军曾与我商量，可否将驻在华北之东北军全部南调贵州省作武装调停，以免再引起内乱。我答：“东北军过长江以南颇难发挥力量，恐更易牵入内战漩涡，若认为长江局面不易应付，不如乘王以哲军追击红军徐部之便，请求将东北军移驻洛阳以西地区，对准备抗日复土较为有利。”张将军颇为首肯。

一九三五年，江西红军已突围西走，以北上抗日为号召。武昌

总部于是改为委员长行营，张将军任行营主任，以陈诚为整训处长，整军经武，似作抗日复土之准备。首先划一军队的编制，补充装备，并将所部之骑兵向西北推进，在咸阳集中，逐次沿西兰公路西进，以防止红军打通西北之国际路线。其先头骑兵团胡竞先部与北上红军遭遇于六盘山麓，未能阻止。北上红军不足一万人，遂到陕北与刘志丹部红军会合。蒋遂令张将军组织“剿共”总部于西安，将东北军逐次向西北移动。王以哲军驻陕北延安、洛川一带，董英斌军驻陇东庆阳、合水一带，何柱国骑兵军驻邠州、平凉西峰镇一带，刘多荃师为总预备队，控制于西安以北地区。又值华北何应钦为日所迫签订《何梅协定》，以东北军有抗日情绪不宜于驻华北，乃将于学忠部逐次调驻天水，以商震继任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旋亦任甘肃省主席。是年秋后，王以哲部何立中师自延安南调换防，途经甘泉北方劳山隘路，何中伏身死，所部损失颇大，张将军乃决心改取守势。又值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于南京，张将军偕柱国以军队代表名义出席南京五全大会，并通令所部在开会期间不许有所行动，以便在政治上有所活动。张将军曾赴沪与人民阵线七君子取得联系，并闻红军绕道川西北上时与张国焘、徐向前部会合于松潘毛儿盖。张国焘主张在四川进行阶级革命，以此为根据再图进展，北上红军主席毛泽东则坚持北上抗日。张将军曾对我说：“内战不停止，很难造成抗日之局势，从前我认为非先统一则不能抗日，现在我则认为非抗日则不能统一。”当时杨虎城将军亦与人民阵线有

密切往来，杨、张之间本有误会，经此一行得以解除。会期方毕，忽接西安总部来电，董英斌部牛元峯师自合水东进应援王以哲军，牛在直罗镇中伏身死，所部损失甚重。张将军大为震怒，因前已有令：在开会期间不许行动，因何违令？急欲飞返查办此事，乃匆匆告知柱国随行，并未询问气象状态，即自南京起飞，一路在云雾之中，盲目飞行，飞机又无定向设备，按时间与距离计算约达河南平原之时乃猛降低飞，才找到平汉铁路。飞机离地不过二百公尺，沿平汉路北飞找到黄河，再沿黄河西飞。过孟津以后，河曲山高，云重谷狭，不能辨别前景，危险万分，最后才找到洛阳降落。是日大雨不止，翌日改乘火车返陕。查得牛师失败原因，乃董军因缺粮而请示总部今后行动方针，总部的指示仅说明该军迟早是要东进的。董军长误解电意，又因鄜州粮食较丰，遂冒然令牛师东进。张将军对参谋长晏道刚，军长董英斌大为斥责。

一九三六年张将军时常坐飞机出巡于洛川西峰镇、西安之间。一日我随张乘机低空飞行，他自己驾驶飞机，游览于咸阳北原汉武帝、唐太宗、文王、武王、秦始皇各陵寝，慨然叹曰：“人贵有所建树，以垂史册。否则建筑工程无论如何壮丽伟大，若此许多陵寝，亦不过只剩黄土一抔。”又登华山有感而题诗，末句有云：“极目长城东眺望，河山依旧主人非。”足见其心情。是年春末张将军依被俘团长高福源之联络，与红军副主席周恩来会于陕北，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之道。周允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停止内战，一致

抗日，但绝对反对法西斯蒂主义。张将军乃与杨虎城将军秘密取得一致意见，使高崇民写“活路”一小册散发于东北军中，鼓动打通西北路线，连络新疆之盛世才，乃能抗日复土，并将“流亡三部曲”宣传于军中，转变东北军士气。是年夏成立王曲训练团，组织抗日同志会，鼓吹打回老家去。并因陕西省党部擅行逮捕总部秘书，张将军以中央执行委员之地位搜查该党部，查得该部密件，对张将军、杨虎城将军、邵力子主席均作了许多不利的报告，因而促成三人之间有所谅解。张将军与红军联系从此益密，并常川驻有代表，所有军事冲突都是假意掩饰。但蒋介石已起疑心，逐次调派中央直属部队移驻西北，拟以蒋鼎文设前线总指挥部于平凉，以东北军任驻剿，防守碉堡线，以中央军任进剿，扫荡红区，并派陈诚援助山西阎锡山，且有调张将军为洛阳绥靖主任之说。时广东陈济棠“六一事变”已完全解决，红军西路军北上拟打通新疆之国际路线，在河西地区为马步芳等军所歼灭，胡宗南军跟踪北上已到甘肃中部地区。于是蒋乃亲来西安，宣慰东北军而有所布置，并准许设立东北军整编委员会，由张将军主持，柱国副之。因此重立预算编制，要求中央有所补充。十月底蒋赴洛阳过寿，张将军偕我前往祝寿，并请求批准东北军整编方案。阎锡山亦来贺寿，并共同与蒋谈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问题，蒋仍主武力解决。张将军问蒋：“中国前途归宿如何？”蒋答：“是社会主义，但不是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阎劝张不必再有所建议。翌晨阎先飞返山西。张将军出席听蒋对洛阳军官

分校的训话，蒋大骂勾结日本者是汉奸，勾结共产党者亦是汉奸，张将军为之色变。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对我说：“不知内容者此话尚无重要关系，知道内幕者听到此话实在太过火了。”嘱我劝张不可误会，并说蒋的脾气说过就完，他想从中弥补裂缝。蒋训话完毕，张将军随即登机飞返西安，在机中我将钱大钧之话告张。张说：“阎百川饱经世故，昨夜劝我不能再谈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之事，我已决心不再谈了。”又说：“我现在想干什么，我的太太亦无从知道。”张返西安后只谈整编东北军之事，不谈“剿共”之事。蒋亦知事不妙，复来西安，轮流约东北军师长以上餐叙，个别谈话。誓言：“有我蒋介石在，一定可以带你们回东北，你们要听命令，不可听谣言。”十二月初，中央军万耀煌部已开抵咸阳附近，谣言四起，情势日急。张乃借词阿拉善旗之定远营发现日本特务机关活动一事，* 拟派骑兵第六师长白凤翔，团长刘桂五，前往查办。张率此二人前往临潼华清池见蒋，请蒋指示方针，实乃借此使白、刘熟悉蒋之住所途径。十二月九日乃北平学生运动一周年纪念日，杨虎城请中央来陕各将领听秦腔，即欲发动扣蒋及其以下各将领，张将军以准备未周，乃延至十一日晚由白凤翔、刘桂五率队突入华清池蒋寓所，不料为蒋宪兵觉察开枪拒之，蒋乃越墙逃避于骊山。杨虎城则扣押住在西京招待所各将领。直至十二日晨八时尚未搜寻得蒋之下落，张将军在绥靖公署对各同僚说：“若找到委员长，我能说

* 一说借口送白、刘回热河打游击，谒蒋请示（第一集临潼捉蒋部分）。

服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我一定拥护他，并自己请罪，以增加他的威信而维持军纪；若找不到他，我便将头割下来请虎城拿到南京请罪，了此公案，绝不能因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旋得报已将负伤之钱大钧送来绥署，张将军遂偕我前往慰问钱大钧，钱破口骂张为“叛逆”，并谓再有十年亦不能恢复中国现状。张将此次事变之宗旨对他解释，并谓：“你亦要负责，假使你允继续来西安担任参谋长，上下不至有所隔膜，也不会演成此事变。”钱仍愤之。因伤势甚重，张劝钱住在我家中善为治疗。旋得报蒋已有下落，搜兵高呼“拥护蒋委员长抗日”，蒋乃知并无为害他之意，遂允乘车入住绥署。先由邵力子前往谒蒋陈述此次事变之内幕，再由张将军往谒，张将军口称：“委员长受惊。”蒋谓：“你还叫我委员长，你还是我的部下吗？”张答：“当然，我唯一目的是拥护委员长抗日。”蒋谓：“那么你应当即刻送我到洛阳，否则法币公债都要完了，经济崩溃，就想抗日亦无从说起。”张答：“总要商定办法，然后回去。”蒋遂写一电报给宋美龄，表示“为国牺牲绝不屈辱”，“对经国、纬国，要视同己出，勿以我的生死为念。”还绝食抗拒。南京空军连日在西安上空示威，陆军则自潼关推进渭南，东北军亦调来渭河南北布防对峙。张将军调我为参谋团主任，会同东北军参谋长董英斌，西北军参谋长李兴中，红军参谋长叶剑英策定作战计划，成立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一面备战，一面派机于十四日往接周恩来，周以事不能即来。十六日再派机接周恩来共商大计，周到后

亦主张和平解决。遂放蒋鼎文回南京说明此间并无害蒋之意，南京方面亦先后派端纳、宋子文、宋美龄等来西安参加谈判，往返洽商，双方商定了和平解决事变条款。张将军还表示要亲送蒋回南京请罪，以增加蒋之领导威信，再由蒋特赦回西安作抗日之准备。红军改编条件则由周恩来与蒋直接谈商。至于一般条件均已商妥后，张将军随于十二月廿四日召集王以哲、董英斌和我三人密告送蒋的决心，三人均阻之，最后建议至多送至洛阳。张嘱咐关于联军军事听命于杨虎城，关于东北军军事听命于于学忠。翌日下午张将军约杨虎城同至蒋寓所（前数日蒋已迁住张寓所附近高桂滋宅），随即于二十五日下午送蒋登机，由张将军陪同飞赴洛阳住宿，廿六日晨蒋自洛阳飞南京，张将军也亲送。张到京后并来电给杨虎城，嘱将被扣南京方面各将领一律释放，遂于廿八日用飞机送返南京。张将军在京办理请罪手续，不料竟开军法会审，由李烈钧、鹿鍾麟、朱培德等主持之。过庭时要摘下张将军之佩剑，张知事已变卦，乃大骂不守信用的政府，说：“剩我张学良一人也要革命”。张被判决十年徒刑，由政府特赦，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时蒋在奉化溪口疗养腰伤，张将军亦被移住溪口雪窦寺中。

蒋派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前往潼关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但又任命陈诚等几路司令作武力解决之准备。其时西安各将领意见不一致，东北军与西北军中之少壮派主张武力争取张将军之归来。高崇民、王以哲、何柱国则主张不应改变团结抗日民族统一之初

衷，即为爭取张将军归来亦只有和平解决才有希望。其利害得失屡次开会辯论，几经说服，几经变卦，终无结果。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少壮派孙铭九等袭杀王以哲、徐方等，我避入杨虎城的新城大楼幸免于难，前线之东北军军长刘多荃、缪徵流等抗不受命，并电话杨虎城，若于（学忠）、何（柱国）有意外则向西安进军。杨要我再与潼关之顾祝同电话商定执行和平方案，即东北军移驻西兰公路陕甘边区，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于学忠仍任甘肃省主席；西北军移至渭河、泾水以北地区；中央军进驻陇海线。顾祝同遂于二月八日进驻西安执行行营主任职务。经此內变，东北军将领对于留驻西北维持原来商定之和平方案已有异议，并有坚决主张出关者，互不信任，意见分歧。顾祝同乃派我飞赴南京，前往溪口将此情势报告张将军，并希望张将军来一手书指示要点，使东北将领步调一致，以便办理善后。我到南京后，许多要人均来告我，西安事变张学良为功为罪要待历史来评论，目前是办善后为要紧，即与何应钦商量到溪口先见蒋面陈事实，均主张东北军出关沿淮河流域驻防，并以安徽主席由东北人充任。我将各种情形面报张将军，并详述在西北已再不能维持“三位一体”。相谈之下，黯然神伤。事已至此，只可执行此方案。张乃亲函各将领“服从中央命令，团结力量作抗日之准备，以遂初衷。”并口头嘱我转告各袍泽：“我为国家牺牲一切，交了一个朋友，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我返西安后传达此意，东北军遂开始遵令出关。中间虽有人作祟欲拆散东北

军，后经于学忠和我以不负办理东北军善后之责任相抗议，并联袂赴溪口再向蒋面陈，乃得发表于学忠为江苏绥靖主任，王树常为开封绥靖副主任，刘尚清为安徽省主席，何柱国为西安行营副主任，第五十一军驻淮安附近，第六十七军由吴克仁继王以哲为军长驻阜阳附近，刘多荃部改编为第四十九军驻南阳附近，骑兵军则留驻西北，在开封开整编会议。是年六月间整编完毕。

（一九五六年六月）

张学良与苏使秘密会晤

焦 绩 华

一九三四年起，我在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第二处工作，主管对苏联的情报。一九三六年春，为解东北军在延安之围，我想劝说张学良不要和红军作战，转而采取联苏抗日的态度。于是请参谋本部次长兼陆军大学教育长杨杰代为介绍。杨在“九一八”事变后曾被蒋介石派去北平帮助了张学良，也赞成联苏抗日。经杨介绍，张复电表示欢迎。我去西安，先见陕西省主席邵力子，他问我来西安何干？我答以劝张学良联苏抗日等意见，邵说：“你真热心啊！为此事特地跑到西安来。”

随即谒张于“西北总部”，他身着浅灰色长袍，小胡须已剃去，顿觉年轻，而且身体健康。谈起抗日他慷慨激昂地说：“东北人抗日的决心，不但是活人要抗日，死了的骨头也要抗日。”由此足见当时张学良抗日的决心是很坚决的。并表示他愿与苏联大使会晤，约定等他到南京后再和我联系。

七月某日，张学良到南京出席国民党中央全会，我应约赶到南京，介绍苏联武官雷平中将会见张氏于南京首都饭店，交谈后，张提出要看一部苏联军事大演习的影片，名叫“基辅争夺战”，是陆

军大演习，有数千人的空军、空降部队参加，当时以为创举，曾轰动一时。雷平武官表示同意，遂安排在南京大华电影院放映。张还约了杨永泰、吴铁城、宋子文一齐去看，苏大使鲍格莫洛夫及武官均在门前相候。国民党二中全会期间，还在国民政府大礼堂放映，国府主席林森以及出席会议的全体委员都看了这部影片。

会议快结束时，张学良对我说，现正开全会，南京中外记者太多，要我约苏使到上海会晤。到上海后，苏使鲍格莫洛夫为了避免干预中国内政之嫌，不愿先去会见正在打共产党的副司令，竟提出要求张氏先去见他的意思。但张学良当时地位仅次于蒋介石，又不愿先去见苏使。恰巧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来到上海，住沧州饭店，我即往见，问他愿否与苏使一晤，邵立即表示愿意。关于邵与苏使会晤之事，我并未向张透露，因陕西省当时属张的辖区之内，邵去拜访苏使似有代表张氏之意。此后，因邵先访苏使，苏使便同意去拜访张学良。在八月间的一天上午，张学良将军在法租界公馆接见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见面后所谈多属应酬，间用英语直接交谈，时间不长苏使就告辞了。第二天上午，张氏回访苏使于苏联驻沪总领事馆，苏联大使开正门欢迎，并预先佇立门口迎候。在回访之前，张氏曾对我说，可否在这次会晤时，提出订立“中苏军事同盟”共同对付日本的问题。我说：“仅在第二次会晤就提出如此重大问题，似嫌过早。”他说：“你马上就要出国了”（意思是我出国后，无适当的人进行联系），我只好同意。由此可见张氏心情之急

迫。

会晤中，苏使备有酒点，席间谈话全用翻译，张氏未说一句英语。张先说：“新疆盛世才曾是他的副官，如那方面有事，可以关照他。”我翻译时改为“甘肃主席于学忠到新疆盛世才，都是张的部下。”苏大使略点头，未作答。后来谈到“中苏军事同盟”问题时，张说：“中国自然非抗日不可，成败与苏联皆有关系，日本野心无穷，苏联终难免受其害。与其单独应付困难，莫如中苏订立军事同盟，共同对付日本。”苏大使答复：“如果中国能够团结起来，苏联政府一定会郑重考虑您的意见。”

归途中，张在汽车上问我：“只要中国团结一致是什么意思？”我说：“大概是和停止打内战有关的。”张接着叹息地说：“中央用着你的时候，则言听计从，用不着你了，便把你一脚踢开，对外可不行啦！”

张学良与苏使会晤，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当时要求抗日的迫切心情。

（政协浙江省委员会一九六六年一月供稿）

《活路》小册子泄密问题

王 惟 之

东北军移防西安后，为鼓舞部队抗日情绪，宣传抗日救国，决定编辑秘密刊物——《活路》，免费给官兵阅读。当时东北军内部没有印刷设备。张学良将军获悉西安绥署军需处有一粗具规模的印刷厂，即以此事就商于杨虎城将军，杨责成他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办理。当时我担任杨的军需处长，王菊人即商之于我，嗣后又和住在我家的高崇民作了具体研究，决定由我监督印刷。我就叫管理该厂的高子桢挑选一些技术优良的工人，于晚间代印《新秦日报》后，接班突击到天明后停止，一切排版、印刷、装订等，均须保密，由我和高子桢轮流监督，按照实印册数配给纸张，不让多印。经过几夜突击印成后，封存储藏室，随即催他们运走。

我们当时对于反特工作毫无经验，自认为这一工作做的相当机密。谁知蒋帮特务早已打入，在深夜从事突击印刷的工人中，即有混入的两个蒋特在内，而我们尚未觉察。事后有人反映说：曾有两个工人窃去偷看。我听到后，一方面及时告诉王菊人，转告高崇民，另一方面立即开始进行侦察。适值总部参谋长晏道刚，手持一本《活路》杂志，来西安绥署面向杨虎城将军提出，并指明系军需